

《史记》将军军事战略思想的可视化图谱构建及价值解读

卢贵灵 樊永浩 张丁昌

陆军步兵学院，江西南昌，330103；

摘要：《史记》作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载体，通过互见法与多维叙事完整保存了中国传说时代至汉初将军的军事战略智慧。本文运用知识图谱技术，系统梳理《史记》中白起、韩信等将军的 200 多场战役记载，构建涵盖战略谋划、战术执行等多维可视化模型。

关键词：《史记》；军事战略；可视化图谱；多元价值

DOI: 10.69979/3029-2735.25.12.094

1 将军谱系与军事活动

中国的“将军”可从制度史与军事史两个维度进行厘定。从制度史演变看，“将军”作为军事职官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及以前时期为卿大夫统军的泛称。如《周礼·叙官》的“凡治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1]，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卿，平时处理政事战时带兵出征的情况。

“晋献公初作二军，公将上军，未有其号。魏献子、卫文子始有将军称”^[2]，则记录了春秋时晋国首次出现“将军”称号。战国时期“将军”成为专职武官称号，伴随着战国诸侯纷争，各国纷纷军事改革，普遍建立起国君集权专制下以文官之长丞相和武官之长将军的官僚制度，实现了文武分职，专职武官诞生。如齐威王任邹忌、田婴为相，又设田忌、申缚为将。此后随着专职武将的大量涌现，“将军”一词逐渐成为高级武官的通称，不论其身份是“大将”，还是“副将”“裨将”，统称“将军”。^[3]直到西汉，才正式确立将军制度，所谓“将军定以为官名”^[4]，形成了称号固定的“重号将军”与战前临时设置的“杂号将军”二元体系。

本研究《史记》“将军”的概念，除了以上制度层面上的名义“将军”，还须具备军事史上的两大核心要素：一是拥有不凡军事才能，具备卓越战略战术能力，如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韩信“战必胜，攻必取”（《史记·高祖本纪》）；二是斩获重要军功，有重大战役胜利或军事改革成就，如孙武“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卫青“七战七捷”（《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 130 篇有 82 篇涉及战争，有名有姓的将军达 295 人，其中以名字或封号为标题直接立传有管仲、司马穰苴、伍子胥、孙武等 40 人。这是司马迁着墨最多，战争叙事最详，最能体现《史记》将军军事战略思想的地方，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战争观。此外，附于他人传记或散见于《史

记》其它内容的将军先后有太子申生、狐偃、先轸、荀林父等共计 81 人。这一群体虽然相关的战争叙事不够详细，但不乏一些关键人物和重要战争，有不少经典的军事思想值得学习。其余 174 人均一笔带过，相关内容很少甚至只出现一次姓名。

《史记》写军事人物常以“系列化”的面貌出现。司马迁通过独特的叙事编排，将众多军事人物编织成一个有机联系的英雄谱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军事人物长廊。《史记》以时代为经确立发展脉络，将人物按时代纵向串联构成历史链条，再以地域横向并联形成比较场域，这种经纬交织的编排方式在军事人物列传中体现得尤为典型。^[5]从春秋时期的孙武、司马穰苴，到战国时期的白起、王翦，再到秦汉之际的项羽、韩信，直至汉武时代的卫青、霍去病。每个时代的将领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春秋将领多具贵族风范，战国将领擅长奇谋诡计，汉初将领则体现平民本色，通过时代编排方式展现了军事思想的演进，也折射出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地域为纬进行横向对比，如《白起王翦列传》中的白起、《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赵将廉颇和《史记·田单列传》中的齐将田单，这三位将领分别来自秦、赵、齐三个诸侯国，活跃于战国中后期，其传记篇目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史记》中战国军事史的重要篇章。司马迁刻意将同时代不同诸侯国的将领并列呈现，展现了同一时代各国军事文化的差异，揭示了“得士者昌”的历史规律。同时，《史记》以类型为纲进行专业分类，如《项羽本纪》展现的是统帅型人才，《淮阴侯列传》突出的是谋略型将领，《李将军列传》塑造的是战术型骁将，通过这种分野，司马迁呈现的是军事人才的专业分化。通过系列化呈现，司马迁实际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军事人才类型学研究。^[6]

《史记》写战争胜败强调择任将帅。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描写战争不像《左传》那样将战争胜败归因于外在客观条件，而是归因于战争活动的主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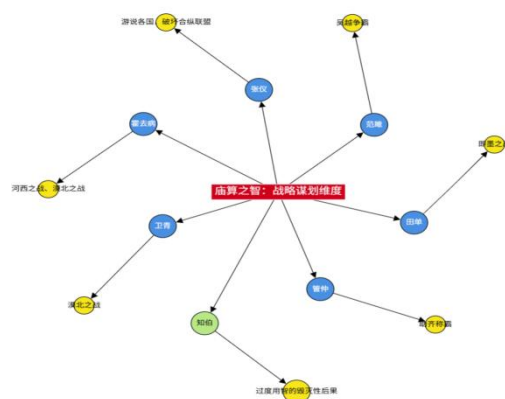
一将帅的作用，突出了人是战争活动的主宰者思想。^[7]为此，司马迁在叙写战争时，以将军为经纬串联，用“智、信、仁、勇、严”等“五德”标准来品评其优劣，“五德”品评体系源于《孙子兵法·始计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兵家传统。但司马迁以史家笔法巧妙地将这一标准进行创造性转化，《史记》叙事中，司马迁将冷峻的军事准则与鲜活的人物命运相结合，使抽象的兵家理论具象为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如对白起“料敌合变”军事才能的肯定与其悲剧结局的记载形成张力，暗示纯军事视角的局限性，这种转化在保留了兵家思想的实用内核的同时，又赋予其深厚的历史哲学意蕴。

2 将军军事战略思想的核心维度及可视化表达

基于前文对《史记》军事人物叙述特征的分析，结合传统兵家如《孙子兵法》提出的“智、信、仁、勇、严”理论框架，我们对《史记》中记载的121位将军进行了梳理，提炼出五大核心军事思想维度，由此初步分析出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体系：

2.1 庙算之智：战略谋划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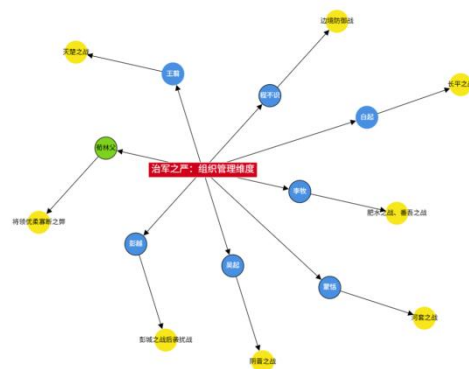
这一维度主要体现在军事决策的预见性和系统性上，司马迁通过“太史公曰”等评语，着重突出了将领的战略眼光，如《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战略欺骗，通过地理遮蔽与信息操控实现“能而示之不能”的战术哲学，张大可指出此战是“古典战役设计的范式突破”^[8]。展现了“兵者诡道”的智慧；《孙子吴起列传》中孙臆“围魏救赵”的战术设计，体现了“攻其所必救”的战略思维。此类智谋军事思想，还有管仲、张仪、范雎、卫青、霍去病、田单等58人。这类记载的归纳标准为是否通过谋略改变战争态势，是否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孙子兵法》“上兵伐谋”思想在《史记》中具象化为三重战略境界：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淮阴侯列传》）以虚实之术破解秦岭天险，其战略欺骗术完美诠释克劳塞维茨“战争迷雾”理论——通过地理遮蔽与信息操控，使章邯陷入“不知其所守”的认知困境；张仪“连横破纵”（《张仪列传》）则超越传统伐兵模式，以“许地六百里”的外交欺诈重构地缘格局，印证大国政治博弈的枢纽作用；管仲“通货积财”（《管晏列传》）更将战略维度扩展至经济领域，通过盐铁专营瓦解列国经济基础，实现“不战而诸侯自至”的战略奇效，体现司马迁对全域战争观的超前认知。



▲“庙算之智：战略谋划维度”可视化简略图谱

2.2 治军之严：组织管理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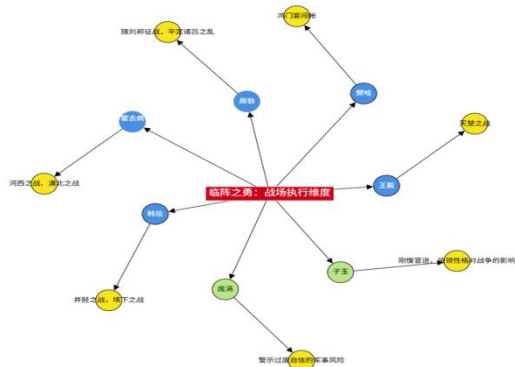
此维度关注军队制度建设与纪律约束。司马迁在《司马穰苴列传》中详细记载了司马穰苴“立表下漏”的严格治军过程，《绛侯周勃世家》描写周亚夫细柳营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的严明军纪。《史记》治军之严的记载还有吴起、白起、王翦、蒙恬、李牧、程不识等85人，其归纳标准为是否建立系统的军事制度，是否做到令行禁止，是否形成高效的指挥体系。这类记载往往与法家思想密切相关，司马迁通过制度比较揭示军事管理的演进逻辑：司马穰苴“立表斩庄贾”（《司马穰苴列传》）以日晷测时、漏刻为约，开创中国最早的军事法典体系，《司马法》“冬夏不兴师”的军礼传统，较韦伯科层制理论早五百年实践制度理性化；商鞅“斩首授爵”（《商君列传》）将法家“刑德二柄”转化为可操作的军功体系，使秦卒成为“闻战顿足徒赍”的战争机器，其制度建构暗合马基雅维利“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政治哲学；周亚夫细柳营“天子按辔徐行”（《绛侯世家》）的经典场景，则演绎制度权威对皇权的超越，这种“法重于势”的管理智慧，在汉文帝“嗟乎，此真将军矣”的慨叹中获得终极历史认证，被视为“科层制管理的早期实践”^[9]。



▲“治军之严：组织管理维度”可视化简略图谱

2.3 临阵之勇：战场执行维度

该维度聚焦将领的战场指挥能力与个人勇武。《项羽本纪》“破釜沉舟”的决绝，《李将军列传》“射石没镞”的神勇，都是典型例证。其选取标准着重于战场应变能力、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危急关头的决断力。此类记载还有樊哙、霍去病、周勃、彭越、黥布、韩信等 70 人。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勇”的评价具有辩证性，既赞赏必要的勇气，也警惕匹夫之勇的局限。战场勇武在《史记》叙事中呈现哲学深度。项羽“破釜沉舟”（《项羽本纪》）以摧毁后勤保障激发楚军死志，其孤注一掷的决策模式，既体现《吴子》“必死则生”的极端情境智慧，又暗藏“刚不可久”的悲剧宿命。李广“解鞍惑敌”（《李将军列传》）面对匈奴铁骑，以“纵马卧”的逆向操作达成心理威慑，将《孙子兵法》“形人而我无形”的虚实哲学推向新境。霍去病“舍幕府而就粮敌”（《卫将军骠骑列传》）的千里奔袭，则突破阿喀琉斯式个人英雄主义，在汉军建制化骑兵体系支撑下，开创“精确打击”的战争新模式，使勇武精神升华为可复制的战术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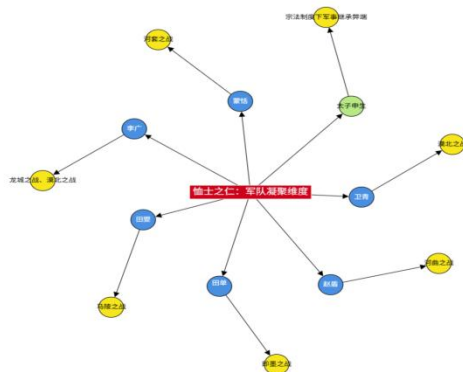


▲“临阵之勇：战场执行维度”可视化简略图谱

2.4 恤士之仁：军队凝聚维度

这一维度强调将领对士卒的体恤与关爱。《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得赏赐辄分其麾下”。其归纳标准包括是否做到官兵一体，是否重视士气培养，是否关爱士卒生活。《史记》共记载了卫青、李广、李牧、田单、蒙恬、赵盾、田婴等 83 人。司马迁通过对比霍去病“不省士”与卫青“善遇士”的不同做法，表达了对这一维度的特别重视。《史记》记载的官兵关系典范映射古代治军思想的多维向度：吴起“吮疽疗伤”（《孙子吴起列传》）将儒家“仁者爱人”转化为情感治理实践，士卒“战不旋踵”的忠诚，验证身体政治学的象征力量；卫青“赏赐尽予士”（《卫将军骠骑列传》）建立“功归于众”的利益共享机制，使汉军成为“敢深入力战”的铁血之师，展现霍曼斯社会交换理论的历史先声；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李将军列传》）的严整治

军，则揭示制度约束与情感认同的辩证关系——其“士卒虽劳，然虏亦不得犯我”的治绩，恰是法家“信赏必罚”与儒家“仁者治人”的思想合流，被认为是“展现法家纪律与儒家仁爱的融合”^[10]。



▲“恤士之仁：军队凝聚维度”可视化简略图谱

2.5 守约之信：军事伦理维度

该维度关注军事活动中的诚信原则。《季布栾布列传》“一诺千金”的美谈，《魏公子列传》“窃符救赵”的义举，都体现这一思想。其归纳标准在于是否信守承诺，是否遵守战争规则，是否保持政治诚信。《史记》此类记载有韩信、项羽、信陵君魏无忌、季布等 118 人之多。司马迁通过项羽违背“鸿沟之约”导致失败的案例，反证了该维度的重要性。季布“一诺千金”（《季布栾布列传》）为汉初政权铸就信用基石，其“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民间口碑，既契合康德绝对命令的道德律令，又暗合《左传》“信，国之宝也”的战争伦理，被司马迁誉为“政权合法性基石”，韩兆琦评其“道德律令与政治诚信的完美统一”^[11]；项羽“背鸿沟之约”（《项羽本纪》）导致诸侯离心，韩兆琦谓之“恃力弃信，终失天道”，在叙事逻辑中完成对霸权主义的道德否决；信陵君“窃符救赵”（《魏公子列传》）的伦理困境最具理论张力——为践行“不负赵”的承诺而逆违王权，这种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冲突，最终在“却秦存赵”的历史功业中获得救赎，展现司马迁超越时代的伦理弹性。



▲“守约之信：军事伦理维度”可视化简略图谱

3 军事战略思想的多元价值体系

3.1 德治与武力结合的治国方略

《史记》通过五帝三王的治国实践，构建了“内圣外王”的军事哲学。《五帝本纪》中，黄帝“修德振兵”的记载确立了德武并重的治国典范。舜帝“流共工于幽陵”的处置方式，展现了德治优先、武力为备的治理智慧。商汤“网开三面”的德政与“鸣条之战”的武功形成鲜明对照，揭示出“以德服人”与“以力制暴”的辩证关系。司马迁特别强调，真正的王者须兼具“柔远能迩”的德化能力与“执干戚以舞”的威慑力量，这一思想在《夏本纪》对禹王“声教讫于四海”的记载中得到充分体现。

3.2 选贤任能的人才战略

《史记》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军事人才选拔理论。在《殷本纪》中，汤王突破世卿世禄制任用伊尹为相，开创了“选于众，举于仇”的用人传统；武丁“梦得圣人”而举傅说的记载，体现了“不以卑贱而不用”的用人气度。司马迁通过《孙子吴起列传》中“智、信、仁、勇、严”的五维评价体系，将人才标准具体化：孙武的“智”体现在兵法创作，吴起的“信”表现为与士卒同甘共苦，乐毅的“仁”反映在宽待齐国百姓，项羽的“勇”展现在巨鹿之战，司马穰苴的“严”凸显于军法如山。这种人才观突破了单纯军事能力的局限，形成了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

3.3 政治正当性的战争伦理

《史记》开创性地提出了“义战”理论框架。在《周本纪》中，司马迁详细记载了武王伐纣前的《牧誓》，通过“牝鸡司晨”等政治指控，构建起“吊民伐罪”的正义叙事。商汤“葛伯仇饷”的战争借口，揭示了军事行动需要道德包装的政治智慧。与之相对的是，《项羽本纪》中“烹说者”的暴行记载，从反面论证了政治正当性的重要性。司马迁通过对比白起“诈而坑赵卒”与韩信“义不帝秦”的不同选择，深刻阐明了军事行动必须服从政治道义的历史规律。

3.4 民心向背的社会基础

《史记》的军事叙事始终贯穿着“民本”思想。《秦本纪》

记载商鞅“令民为什伍”的基层动员体系，揭示了军事力量的社会根基；《越王勾践世家》中“十年生聚，

十年教训”的记载，展现了战争潜力的积累过程。司马迁特别关注军事与民生的互动关系：《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时期的战时经济政策，《货殖列传》分析战争对商业的影响。在《陈涉世家》中，“天下苦秦久矣”的民心洞察，成为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印证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军事政治规律。

3.5 谋略制胜的战争艺术

《史记》通过典型战例，构建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的完整体系。《孙子吴起列传》中“减灶诱敌”的心理战术，《淮阴侯列传》“背水列阵”的风险管控，《田单列传》“火牛阵”的创新思维，共同构成了谋略运用的经典范式。司马迁特别强调“上兵伐谋”的思想。《张仪列传》记载的连横战略，展现了外交谋略的威力；《范雎蔡泽列传》中的“远交近攻”，体现了地缘谋略的精妙。这些记载不仅保存了古代军事智慧，更形成了“先计后战”的谋略文化传统。

当然，以上5个维度的军事战略思想，仅是为了叙述方便，绝不是独属于《史记》中某位“将军”的，“将军”们普遍具有全局视野和综合施策的系统思维。

参考文献

- [1] 杨宇. 周礼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653-2654.
- [2]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 通志二十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95：1131-1132.
- [3] 军事科学院主编，吴如嵩等著. 中国军事通史第3卷 战国军事史[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58.
- [4]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点校. 日知录集释（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367.
- [5] 张大可. 史记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67-169.
- [6] 韩兆琦. 史记笺证[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4206.
- [7] 刘贵华. 从《左传》《史记》《三国演义》看古代军事文学的发展[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8.
- [8] 张大可. 史记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15.
- [9] 侯外庐.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M]. 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32.
- [10] 侯外庐.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M]. 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89.
- [11] 韩兆琦. 史记笺证[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3120.